

社，1982:01）頁一二六。

十六、陳夏生，〈雲想衣裳花想容：淺談唐代婦女服飾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2:12（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85:03）頁四～二十。

十七、蘇瑩輝，〈敦煌壁畫供養者像舉隅：隋迄元代服飾史料簡介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:04（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85:07）頁十三～二四。

十八、林維民，〈論中華服飾的重帶傳統〉，《中國文化》，8期（台北：中國文化社，1993:06），頁一二三～二二八。

十九、作者不詳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（上）（下），（台北：龍田文化事業石，1981:11）。

張學良與西安事變

姚怡香*

一、少年張學良

一生傳奇的張學良，公元一九〇一年六月三日，清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生於中國東北，今天的遼寧省台安縣桑樹林子鄉詹家窩堡村。其父張作霖，出身綠林江湖，文化涵養很低，文墨不通，幾乎是個文盲。但張作霖在詭譎多變的政治舞台、爾虞我詐的軍閥競爭下，卻比任何人更懂得掌握時機，一躍而成奉系軍閥的首領，北洋政府的末代元首。因此，部屬尊稱他為「老師」，稱其子張學良為「少帥」（註一）。

張學良十一歲的那一年（公元一九一二年），震驚全國的辛亥革命爆發，中國歷史再度走進另一個轉折點，展開新的一頁。張作霖的勢力即在此時進入東北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—奉天城，張學良也隨其父第一次來到大城市（註二）。一九一二這一年，張作霖成為地方軍事領袖，是其日後璀璨軍戎生涯拓展的第一步；對張學良而言，母親此時過世是其人生的一件大事。母親早逝，父親又熱衷權利爭奪遊戲，雖對其疼愛有加，但卻無法長伴左右，張學良的童年生活，就在父親派來的一批保鑣、隨從、照顧他生活的保姆以及幾位家庭教師的陪伴下度過。雖然生於衆人所羨的權勢家庭，然而優渥的物質生活終究抵不過空虛寂寞的侵蝕。因此，在熙攘喧譁的生活中，常駐心靈的，卻是化不開的孤獨與寂寞。所以，他自己談道：「良方十一歲，慈母見背，先大夫寵愛有加，但忙於軍政，素少庭訓，又乏良師益友……」（註三）。

*歷史學系大學部學生。

註一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（台北：時報文化，1989），頁三八。

註二：司馬桑敦，《張學良評傳》（台北：傳記文學，1989），頁五。

註三：張學良，〈西安事變懺悔錄〉，收入：司馬桑敦著《張學良評傳》，頁三八一。

張作霖稱霸東北後，深感獨依綠林草莽是無法開創大業，加上老師在一連串奮鬥中深受不識字之苦。因此，一九一九年三月，張作霖下令恢復停辦的東三省陸軍講武堂，藉以招攬、培育人才，提高部下的軍事素質。張學良在老師的安排下，進入炮兵科學習，無法一圓其行醫的夢（註四）。此後，少帥漸漸遠離杏林之路，而踏上老師為其選擇的軍人生涯。

張學良在講武堂期間，學習勤奮，博得教官與大多數同學的敬慕，也結識了影響其頗為深遠的郭松齡。戰術教官郭松齡對張學良的雄偉抱負非常賞識，而少帥則佩服郭松齡意志堅強、博學多識、果敢勇武、剛正凜然的軍人氣質，對於其思想、人格，更是五體投地、崇拜有加（註五）。兩人惺惺相惜，互相敬佩。在張學良的要求下，郭作了張學良的副手，專心整治軍隊，使衛隊旅成為奉軍之勁旅。就在張學良、郭松齡漸漸嶄露頭角，地位、聲譽扶搖直上之際，郭松齡卻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倒戈。歷時月餘的倒戈雖然徹底失敗，但此舉幾乎顛覆了老師的軍政權，郭松齡則為此付出生命作為代價（註六）。

一九二八年，張作霖這位赫赫有名、不可一世，在歷來戰役中均能無恙而歸的大元帥，卻在日本人的策畫下被炸死於自己大本營一皇姑屯。老師慘死之後，整個東北軍、政界面臨許多急需解決的問題，張學良做了幾項關於他自己未來及整個東北前途的工作，使整個東北情勢穩定下來（註七）。張作霖遇難後的一個星期內，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，中國關內遂告統一。除東北外，全國各地均高掛青天白日旗，中國統一，已是不可抗拒的潮流。然而，東北當時的處境卻令張學良進退兩難。首先，日本對東北易幟層層阻擾，向張學良施加千斤重的壓力。日本即使冒著干涉中國內政之嫌，也要阻止東北的統一。日本田中首相所派代表甚至表示，如張學良違背田中首相的決議，日本將不惜在東北使用武力……（註八）。另外，八月中旬，蘇俄和外蒙古暗中唆使呼倫貝爾地方蒙古軍隊叛變，前後紛亂擾攘了三個多月，才弭平此變局。譁變事件與中東路內部的若干共產黨工作人員有所關連，這使得張學良警覺到，在長期對外關係上，他不僅要隨時注意野心勃勃、不懷好意的日本，更要遠望北方時時採行蠶食手法的強鄰俄國（註九）。在對內方面，尚有兩個因素致使張學良延緩與國民政府合作的時機。第

註四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四十。

註五：松本一男（著）、吳常春（譯），《張學良—西安事變主角的命運》（北京：中國青年出版社，1992），頁十八。

註六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三八～四九。

註七：司馬桑敦，《張學良評傳》，頁四五～五一。

註八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五九～六一。

註九：司馬桑敦，《張學良評傳》，頁五八～五九。

一、東北內部意見不一。張學良基於權利的取得在於各派勢力的均衡，因此無法輕易表明其立場。第二、國民黨本身內部情勢不穩，也使張學良有所疑慮與怯步（註十）。然而，在一連串的秘密、公開談判後，青天白日旗終於在十二月二十九日高高飄揚於奉天城，中國在形式上完全統一，張學良在東北的地位也更加穩固，不可動搖了。

二、不抵抗將軍

深具野心的日本，趁著中國內亂的機會，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，製造“九一八事變”。

東北易幟後，南京政府在東北經濟發展中，比昔日有了更大的影響力。這個事實，令日本感到沮喪，致使東北與日本的關係更加惡化。東北關東軍的少壯派軍官尤深感不滿，認為日本為東北所付出的“血汗努力”有成泡影之虞。因此，一手策畫出兵東北的計謀，希望趕走中國軍閥，建立一個由日本控制的傀儡國（註十一）。一九三一年夏天的“中村事件”，加劇中日之間的緊張情勢。在日本人看來，前後一系列的事件標明了中國公然蔑視日本權威。無疑地，這是中國向日本挑釁的表示。關東軍趁勢大加渲染，火上加油，日本全國情緒為之沸騰。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上十點，日本關東軍終於出兵了。他們誣蔑中國士兵炸毀南滿鐵路，乘機炮轟東北軍駐奉天的北大營，一路長驅直入，勢如破竹。當時的東北地區仍有部隊十五萬人，而日軍加上日後增集的朝鮮士兵也不過兩萬人之數，雙方兵力相差如此懸殊，而日軍竟能在一夕之間占領奉天，四個月內橫掃東北。為此，中國人民感到咋舌，並視此為華夏子孫的莫大侮辱。人人紛紛把矛頭指向東北的龍頭張學良，認為事變當晚，張學良人不在關外就罷了，但氣人的是，他竟然連個抵抗命令也不下，才使得日本軍能如此猖狂地橫掃東北。人人猜測事變當晚張學良的去向，甚至做詩諷刺張學良的沈醉溫柔鄉（註十二）。事變後民衆紛紛以撻伐其人格與私生活的方式，做為憤恨發洩、責備張學良不抵抗行為的表示。

日本能如此輕易地領有東北，張學良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，但不可完全歸罪於張，因為他僅是不抵抗政策的執行者，而制定此政策並要求張學良施行者，

註十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五六。

註十一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九五～九六。

註十二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一一六。馬君武教授曾為此作下列一詩諷刺少帥：「趙四風流朱五狂，翩翩蝴蝶正當行，溫柔鄉是英雄塚，哪管東師入瀋陽。」

卻是蔣介石。蔣介石在“中村事件”後，曾發電給張學良：

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，我方應予不抵抗，力避衝突，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，置國家民族於不顧。（註十三）

九一八事變當，張學良立即向南京請求指示，南京蔣介石回電中的內容是：為避免局勢進一步惡化，必須堅持“不抵抗原則”。九月十九日，張學良向全國及南京國民政府發表通電，內容如下：

據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將軍報告，日本軍隊九月十八日晚十點開始向我駐紮在北大營的士兵開火。我們堅持不抵抗政策，沒有還擊。但是日本繳了中國士兵的械，還放火燒了北大營，這些情況已經向各有關當局做了報告……日本捏造謊言說是中國人炸掉了南滿鐵路，並聲稱他們進攻中國的兵營是出於自衛，事實並非如此。甚至連日本人火燒北大營時，我們都沒進行抵抗。（註十四）

可知少帥及其部隊完全遵守了蔣介石的“不抵抗政策”。此政策的實行，等於將東北雙手奉給日本，人民為此深深痛恨張學良；少帥不僅失去了民衆的信任及聲望，更被冠上了“不抵抗將軍”之名，受到各界人士的奚落與壓力。

九一八事變後，日本食之得味，於是再度發起侵略行動，先後進攻上海與熱河。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進入上海，挑起更大的戰爭，預備在極短時間內，拿下這座大城市。但由於列強的干預，日本無法得逞其願，我國才得以保有上海。熱河則沒這麼幸運，在諸多因素交相錯雜下，熱河保衛戰失敗了（註十五）。僅僅十天，日本就拿下熱河全省，各界的諷刺與嘲笑再度盈滿張學良的雙耳。在沈重的壓下力，張學良終於辭去他的各項職務，將他的部隊及各種物資移交給蔣介石。不久，少帥在家人和顧問端納（Donald）的陪同下，前往歐洲遊歷。這趟旅程為其人生經驗及價值信念再度寫上新的一頁。

三、西安事變的背景

西安事變的發生，讓各界人士感到震驚與意外，紛紛有措手不及之感。而其戲劇般的經過與收場、從中衍生的各種問題，及政治道德、人性黑暗面的完全展

註十三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九九。

註十四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九九。

註十五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一〇六——一四。

露，更是令人在眼花撩亂之餘，深感政治腐敗與權利鬥爭的可怕。研究西安事變發生的背景，可從當時國內外的環境來深入探索。

日本自恃強大武力和中國唯唯諾諾、小媳婦般的退讓下，野心種子已萌芽地愈趨壯大。他們的目光由東北伸延到華北，並以拿下整個中國為戰志。一九三五年八月，內蒙古自治會的首領蒙古王公德王，在關東軍提供財政支持為交換條件下，答應與日本密切合作。蒙古繼滿洲國後，成為日本另一個僕從國。（註十六）

在華北，日本再度施展其一貫手法，迫使中國屈服於下。一九三五年五月，日本以親日華人被殺作為中國挑釁日本的“無禮行為”，要求南京政府作“合理的補償”，否則即採取強硬措施。為了維護和平，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，著名的“何梅協定”產生。雖然何應欽並沒有正式簽署此協定，但各種行動卻顯示出中國的低頭，這比書面協定更加嚴重。同時，在察哈爾也發生類似事件，結果仍是中國再度退讓，簽定“秦土協定”。此後，非軍事區由河北擴大至察哈爾（註十七）。

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，日本外相廣田向南京政府提出“對華三原則”聲稱日本願意在此三原則下與中國達成談判協議：

1. 中國政府不應挑撥一個大國反對另一個大國，中國要終止與歐洲和美國的關係，只與日本建立友好同盟。
2. 日本希望中國政府承認——如果不是在法律上，至少應在實際上承認滿洲政府。
3. 應建立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密切合作關係，攜手反對中國的共產黨。不僅在北方，而且在全國各地消滅共產黨。（註十八）

廣田三原則旨在逼迫南京中央政府讓步；與此同時，日本重施舊技，以建立傀儡政權的方式，使傀儡政權行使地區漸由中國分離獨立而出，其在華北建立表面上由中國人領導的自治政府——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，以冀東行政專員殷汝耕為首。原為抵制此政權而設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，也在日本種種威逼利誘下，逐漸走向“自治”之路。（註十九）

日本對華北的各項安排，視華北為囊中物的心態昭然若揭，加上國民政府的

註十六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一四三～一四五。

註十七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一四五。

註十八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一五一。

註十九：司馬桑敦，《張學良評傳》，頁二二一。

對日妥協政策，諸此種種引起了天津地區知識界的恐慌與危機意識，各種學生愛國運動與組織更是如雨後春筍般的興起。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來自各個大學、中學近千名的學生，集體遊行至何應欽的司令部請願，請願內容是：

1. 反對所謂“自治政府”。
2. 外交公開。
3. 停止任意逮捕學生。
4. 保護領土完整。
5. 停止一切內戰。
6. 保證言論、出版、集會和結社自由。（註二十）

何應欽拒絕接見學生。示威人群往日本領事館前進。途中，學生與軍警衝突，許多學生遭到逮捕與毆打，此即著名的“一二九事件”。相似的請願活動仍不斷地在華北舉行，這些活動掀起了全國的抗日風潮：廣州、上海、濟南、武漢、長沙、西安、天津、杭州、南京、開封等均發起抗日運動，學生愛國團體在各地紛紛成立。一九三六年五月底，全國五十個愛國團體代表齊聚上海，共同創立了“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”，形成一個反對日本帝國侵略的全民族救亡圖存運動。（註二一）

學生運動一波波的展開，直接的刺激是日本放棄透過外交方式接管整個華北的行動，而改用武力為手段，加緊侵略華北。這些學生運動也迫使南京政府正式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挑戰。蔣介石曾向各級學校代表表示：他絕不會簽署任何有損於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條約和秘密協定。學生愛國運動更對張學良造成了絕大的影響。不久，西安成為反叛的城市，蔣介石從西安安全歸返後，終於擔起了領導全民族共同抗日的任務。學生運動在張學良此次震驚各界的行動中，占有不可小覷的影響力。因此，這一時期的學生反日愛國運動可視為中國不抵抗政策結束的開端；其在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性不下於五四運動。

這個時期，國民黨內部的反蔣派，姑且不論其最後意欲為何，表面上，也都扛著抗日的旗幟。馮玉祥自稱“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”、西南兩廣的地方實力派、失意的改組派份子等等，都以全力抗日和反對投降為理由，反對蔣介石的專斷獨裁行為。日本則存著看好戲的心態，希望中國因此爆發內戰，日本正可坐收漁翁之利，一舉獲取其所欲者。可幸的是，種種戰端在各方的奔走調停下被弭

註二十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一四八。

註二一：郭廷以，《近代中國史綱》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六四〇～六四一。

平，不動干戈地收場，免除了危險的局面。（註二二）

此時的張學良正在西安指揮東北軍圍堵陝甘邊區的共軍，但卻連連失利：六十七軍的一一〇師全軍覆沒，師長何立中戰死；一〇九師於直羅鎮覆沒，師長牛元峰拒降自殺。軍事的失利、優秀部下的犧牲、要求重建兩師陣容被拒、東北軍官兵的薪水和津貼比中央軍少百分之二十（註二三），凡此種種，讓流離失所、遠離家園的東北軍感到寒心與失望；在此同時，流言四起，有人聲稱東北軍的西調是蔣介石慣用的手法：讓地方勢力與其心頭大患對戰，既可削弱地方強大勢力，又可去其眼中之刺，正是蔣氏一石兩鳥之計，再加上“抗日救國宣言”的影響，更使張學良感到東北軍人不死於抗日而死於剿匪是非常無辜的事。此外，他在五全大會中親眼目睹南京中央要員間對國事的麻木、私鬥的熱衷，這批人不但抗日，反而有親日傾向。種種的打擊，使張學良更加苦悶；再加上人事因素的影響：總參謀長晏道剛的監軍嘴臉，引起東北軍之不快；東北軍隊要求抗日；文人朋友沈鈞儒、王造時的鼓勵；刺汪者孫鳳鳴的言行等等，使張在心態上漸有轉向抗日而不願剿匪的念頭；不久，得知楊虎城也懷有同樣想法後，便開始與中共聯絡，展開談判。當時，張學良使用多方管道尋求與共產黨聯繫。他在上海會見了東北抗日義勇軍將領李杜，委託李杜設法打通與蘇聯及中共溝通的管道（註二四）；同時，密令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在前線與中共秘密聯繫。（註二五）

這時，中國共產黨也加緊對張學良及東北軍的統一戰線工作，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、葉劍英為輔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，指導對東北軍的爭取、聯絡工作。（註二六）在高福源、李克農、劉鼎等的鋪路下，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，周恩來、李克農、劉鼎與張學良、王以哲在延安的一座天主教堂舉行秘密會談。雙方主要討論了以下問題：

1. 停止內戰、一致抗日問題。
2. 抗日救國的道路問題。
3. 聯蔣抗日問題。
4. 聯蘇問題。
5. 停戰、通商、合作問題。

註二二：司馬桑敦，《張學良評傳》，頁二一五。

註二三：張學良，《西安事變懺悔錄》，收入：司馬桑敦著《張學良評傳》，頁三八三。

註二四：張學良，《西安事變懺悔錄》，收入：司馬桑敦著《張學良評傳》，頁三八四。

註二五：張梅玲，《干戈化玉帛—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》（北京：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，1991），頁二三三～二三四。

註二六：張梅玲，《干戈化玉帛—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》，頁二三四、二三七。

6. 培訓幹部。(註二七)

張學良與周恩來的這次會談，對雙方都具有重大的意義。對中共來說，會談不到一個月，便將反蔣抗日口號改為聯蔣抗日。這個策略的轉變固然是中共對國內外局勢通盤考量的結果，但不能排除少帥的影響與建議。對張學良來說，這次會談使他完全了解共產黨主張抗日，要求建立統一戰線的決心和誠意，因此，更加堅定自己的主張(註二八)。張學良與周恩來會談之後，紅軍與東北軍的關係由互不侵犯進展到互相合作。少帥對共產黨的態度也發生巨大的變化，對共產黨充滿好感。此外，共產黨更大大加速對東北軍的滲透，甚至在西安成立聯絡處。

張學良與周恩來的秘密會談後，說服蔣介石與中共聯手抗日成為他最重要的職志。一九三六年十月，日軍率領蒙古軍與滿州國的軍隊進攻綏遠，綏遠駐軍傅作義奮起抵抗，綏遠戰事爆發。蔣介石以民族大局為藉口，不派兵支援綏遠。鄰隔的東北軍群情譁然，要求“支援綏遠、抗擊日寇”；在部隊的要求下，少帥致電蔣介石，要求派東北軍前往支援，但遭蔣介石拒絕；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張學良再度致電，再遭拒絕……。與此同時，南京政府逮捕了上海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七位領袖。為此，少帥到洛陽見蔣，要求釋放七君子，蔣再度斷然拒絕……。凡此種種，除了使張學良深感刺激與憤怒外，更加深東北軍要求抗日、拒絕剿匪，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想法；加上在共產黨的有力宣導下，東北軍剿匪士氣低落、抗日情緒日漸高昂(註二九)。此時，南京政府已獲知東北軍與紅軍間的停戰協定，蔣介石決定在西安召開軍事會議，討論剿共問題，並且振奮官兵士氣。十二月四日，蔣與其嫡系部隊，分別抵達西安與潼關。蔣單獨接見東北軍的將領，試圖使他們接受自己的觀點，但慘遭滑鐵盧。這時蔣介石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，因此在十二月七日與張學良進行三小時的談話。少帥在蔣介石不為所動的情況下，開始談起統一戰線。他說，共產黨也是中國人，在國難當前下，應與他們聯合，共同抗日，而非互相傾軋。蔣介石大罵張學良受了共產黨的蠱惑，告誡張學良，中國最大的敵人是中共，而非日本人(註三十)。蔣、張之間的衝突完全表面化、公開化。

十二月十日，蔣介石決定撤換張學良的職務，將東北軍調往福建，改以中央軍作為剿匪的主力；而東北軍此時則偵察到蔣介石將要發動命令，逮捕東北軍和

註二七：張梅玲，《干戈化玉帛—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》，頁二四〇～二四三。

註二八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一三四。

註二九：李雲漢，《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》(台北：近代中國出版社，1982)，頁二三～二六。

註三十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一九〇。

西北軍中的可疑軍官，可能包括張學良與楊虎城(註三一)。層層危機籠罩下，他們決定出其不意，先發制人，實行強諫劫持之謀。

四、西安事變

十二月十二日，西安事變拉開序幕。蔣介石與各中央軍政要員及兵員共三百多人立即成為俘虜。張楊二人自任抗日聯軍總司令與副總司令，並且向各界發出公開電報，提出八項主張：

1. 改組南京政府，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。
2. 停止一切內戰。
3. 立即釋放上海被俘之愛國領袖。
4. 釋放全國一切之政治犯。
5. 開放民衆愛國運動。
6. 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。
7. 確實遵行總理遺囑。
8. 立即召開救國會議。(註三二)

張學良至十四日始向蔣介石提出此八項主張，蔣謂：

已決心犧牲此身，以維持國家之正氣……須知此身可被劫持，而意志萬難劫奪，余決不稍有遷就。非余到京，不欲聽爾對此事有隻字之陳述，多言無益也。(註三三)

蔣之態度強硬，直到宋美齡抵西安後，始行“大幅度”轉變。

雙十二事件發生後，除了震驚南京政府各階層外，更令全國人民目瞪口呆。中央在事變當晚即舉行會議，會議中對問題的處理爭議許久；以戴傳賢為首的一派，認為“中央不可曲從其狂悖，陷國家於淪胥，更不能過於瞻顧蔣介石之安全，而置國家綱紀於不顧”，主張以武力解決；另一派則認為“應先探其虛實，再定萬全之策，而內戰只會坐弱國力，益以外患，國將不就，皇綱綱紀？”(註

註三一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一九二。

註三二：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輯委員會，《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》(台北：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委會，1984)，頁四九一。

註三三：蔣介石，《西安半月記》，收入：朱文原(編)《西安事變史料》，第三冊，(台北：國史館印行，1994)，頁五一九。

三四)最後決議並未論及是否討伐西安,但軍隊卻早已往潼關開進。

當時國內外輿論對事變的反應,除了少數地方實力派之外,大多是對張、楊的規勸,甚至撻伐。胡適即在大公報上寫了一篇名為〈叛逆張學良〉的社論,除了對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辯護外,更大加討伐統一戰線政策。甚至與少帥心照不宣的閻錫山,也譴責張學良的行為過於草率。(註三五)

共產黨對此事一無所知,因此,當其獲知蔣介石被挾持的消息後,在這個問題上分為兩派:一派主張殺掉蔣介石以報十年來的深仇大恨;一派則贊同以蔣為人質,逼迫南京政府抗日,並使西安因此取得軍事優勢。然而史大林的電報卻指稱此事件是日本人的陰謀,將中共領導人搞得一頭霧水。中共冷靜下來,對此事重新加以分析:他們了解無論任何人都無法取代南京最高領導人一蔣介石,他們相信單是蔣介石一人就有權力和威望停止內戰,領導全國進行抗日戰爭;如果西安事變無法獲得和平的解決,可能會引起一場極為慘烈的內戰,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場災難,對共產黨的前途更加不利,且讓日本人有機可乘(註三六)。因此,決定採取和平政策:寧向南京妥協,堅持反對內戰。中共前後態度的轉變,讓張學良感到被利用了,他雖未做出任何表示,但心裏已經有數了。(註三七)

在一片國家尊嚴、武力討伐聲中,唯有宋美齡、宋子文和孔祥熙等人,將蔣介石的安全視為頭等大事來考量。他們確信張、楊的政策是要求進行抗戰,而抗日是蔣「素來已久的決心」;如果這次事變的目的真是為了要求改變國家政策,將砲口一致對日,那麼,就有可能經由談判解決此事。宋美齡要求暫緩進攻西安的計劃,並派端納前西安採用事探的真相。端納與張學良短暫交談後,才瞭解情況的複雜性;單是少帥本人並不能決定蔣介石的釋放與否,還必須獲得其他高級將領的同意,特別是楊虎城。但蔣介石仍安然無恙,畢竟是好消息。

十二月十六日,何應欽正式宣布對張學良進行討伐。他們雖已得知蔣介石平安無事的訊息,卻不願等待情勢更進一步地明朗化,便急於開啓戰端。這其中的奧妙處,在於當戰爭可帶給特殊份子特殊利益時,他們便會不顧生靈塗炭地引起戰事。難怪宋美齡會大呼「居心不良」。(註三八)

在端納與宋子文先後探訪西安之後,他們確信可以找到一條和平解決西安事

註三四:何應欽,《西安事變的處理與善後》(台北: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,1984),頁二九~三四。

註三五:傅虹霖,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,頁二一二~二一五。

註三六:傅虹霖,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,頁二二二~二二四。

註三七:司馬桑敦,《張學良評傳》,頁二六四~二六六。

註三八:傅虹霖,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,頁二三九。

變的路,但仍有障礙。端納在接受採訪時表示:

盡早釋放委員長是有希望的……。楊虎城將軍的態度是個大問題,他的軍隊控制著西安城,所以蔣介石的命運掌握在他們的手中……。爭取楊將軍和他的部下比與張學良打交道更為困難,因為楊將軍及其軍隊有一種更激進、更不妥協的觀點。況且,楊將軍的軍隊紀律鬆懈,非常不可靠。(註三九)

端納的顧慮是有所根據的。楊出身貧寒,既沒有張學良東北軍那樣強大的勢力,與蔣介石的關係也不似張與蔣間之親密。他只能在中國各種複雜的權利鬥爭與政治妥協的縫隙中,小心翼翼地爭得自己的生存空間。楊虎城認為若輕易放蔣,無異是放虎歸山,日後必定無法逃脫蔣介石的報復;對於張學良主張只要蔣介石接受他們的建議,改變既定國策,不但可以釋放他,而且仍擁護他為領袖的想法感到不以為然。楊虎城的態度,是釋蔣與否的重要關鍵之一。

但此時端納、宋子文與張學良間,則已達成一股默契。蔣介石儘管對外宣稱若不放他,任何建議皆是枉然,然而事實上,此時蔣介石與張學良間對某些議題已建立一致的共識。十二月二十二日,宋美齡抵達西安,加速了談判的過程;因為除了她之外,沒有任何人可以說服蔣介石,而蔣的態度是決定張學良是否釋放蔣的要素。

周恩來此時則在中共的指導方針下,開始對少帥施加影響。他向張學良表示,目前中國所需的是舉國一致的抗日,而不僅僅限於西安一角;中國需要的是統一和合作,而非分裂或內戰。只要能爭取到蔣介石抗日,就應該體面地釋放他,並擁護他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袖。此議與張學良兵諫的目的不謀而合;雖然中共的反應讓張學良感到意外,但對中共所表現出之深明大義則表示佩服。張學良把說服楊虎城的擔子交給周恩來。雖然楊虎城並不贊成釋蔣的主張,但在周恩來與張學良皆同意之下,楊虎城終於答應放蔣,但表示萬萬不可草率(註四十)。周恩來的影響,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一大原因。

十二月二十三日,西安、南京和共產黨各方代表舉行正式會談,討論釋放蔣介石的條件。經過長時間的討論、爭議後,獲致下列的結果:

1.關於停止內戰、撤軍一項,宋氏兄妹答應負責辦理。

2.關於改組政府一項,原則通過,蔣介石辭去行政院長職務,張學良提名宋子文接任。宋認為孔祥熙是更合適的人選,他可任副院長兼財政部長。其他內閣

註三九:傅虹霖,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,頁二四四~二四五。

註四十:傅虹霖,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,頁二四三~二五二。

部長、次長，均由張、楊推薦，以驅逐親日派，吸收抗日人士為原則。

3.關於釋放愛國領袖，保障民主權利一項，原則通過。宋子文答應回南京即陸續釋放七君子和其他政治犯。

4.關於停止剿共，一致抗日一項，宋子文提出抗戰不能馬上爆發，現在只能做抗日的準備工作。剿共可立即停止，抗日全面爆發後，共產黨可以公開活動，國共可公開合作，紅軍更改編制，由國民政府統一指揮。

5.關於召開各方救國會一項，原則通過。

6.關於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一項，一致通過，並具體指出，最重要的國家是英國、美國與蘇聯（註四一、四二）。

此外，宋氏兄妹答應：

1.關於接濟紅軍一項，由周恩來和張學良具體商定，宋子文負責撥給。

2.關於西北善後一項，將西北的軍事、政治工作全權委託張學良和楊虎城負責。

會議雖有初步結果達成，但卻必須設法使蔣介石接受。對於決議，他不得不同意，但仍拒絕作書面簽字，而是以“領袖的人格”作擔保，保證日後一定兌現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，張學良向楊虎城及其高級將領表示，他要釋放蔣介石。楊虎城等人與張學良發生激烈爭吵，在周恩來調解下，楊虎城終於被說服，答應接受蔣介石的口頭允諾、人格保證，慨然答應放蔣（註四四）。同日下午，張學良決定立刻放蔣回南京。他認為自己有責任維護領袖的威信，而最好的行動便是親自送蔣回南京。他想以此行動，來證明自己無意加害於委員長，一心一意為國家為民族的赤膽忠心與坦蕩無私（註四五）。楊虎城則對張學良英雄般的感情用事無力阻止；在張學良陪同下，蔣介石英雄式地凱旋回京，西安事變落幕。

在蔣介石主導下，軍事法庭公開審判張學良。這對張學良而言，無異是晴天霹靂，局勢於此刻完全扭轉，張反成任蔣宰割的魚肉。對於蔣的行為，他在法庭上大怒曰：

你們當中唯一應該受到指責的就是委員長，只有他才能使中國喪權辱國，如

註四一：朱文原（編），《西安事變史料》，第四冊，（台北：國史館印行，1995），頁一二八～一二九。

註四二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二五三～二五五。

註四三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二五三～二五五。

註四四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二五九。

註四五：趙稜熹，《西安事變》（台北：漢湘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1995），頁一九八～一九九。

果我自由，一定要發動一場革命。（註四六）

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張學良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，剝奪公民權五年，但隨後政府發布特赦令，將十年有期徒刑予以赦免，但交由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。（註四七）

五、結論

張學良發動的西安事變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極為重大的事件，它拯救共產黨免於被消滅，迫使蔣介石容共抗日，促成中共革命事業的成功，實際上等於間接幫助了中共統一整個中國。然而，西安事變也迫使蔣介石停止那使得中國無力對日的剿匪戰爭，團結全國一致對外抗日，粉碎日本的大東亞美夢，除了免除自己的危機外，更使得其他國家免遭日本的荼毒（註四八）。如果不是張學良堅持己見——甚至因此而犧牲自己，可能這一場對日戰爭便不會進行，因為，蔣介石的手下幾乎全為親日派，連蔣本身的親日色彩也非常濃；張學良此舉，使得蔣介石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。

隨之而來的對日抗戰，使得南京政府在實際上統一中國。所有的地方實力派、政客以及共產黨員都與蔣介石一道對抗日本；中國真正的統一，張學良的影響應被記上一筆。（註四九）

張學良在此事件中最大的敗筆，也是最大的後遺症，便是過於天真，不知政治鬥爭的可怕。他缺乏對政治的真正體認，而這正是造成他被幽禁數十年的原因。張學良曾於一九九〇年接受日本NHK的訪問，在論及九一八事件時曾說出這樣一段話來：

我們判斷事情時，不能只憑自己的主觀來判斷，我們必須站在對方的立場來判斷情況，並考慮對方的利益。（註五十）

九一八事件時，張能夠理性地站在敵手日本的立場來思考、判斷（雖其判斷結果失誤，但方法是正確的）；然而西安事變時，卻因自恃與蔣交情深厚的情況下，模糊了事件的焦點，盲目地一頭栽入，終而釀出一生之禍。他視蔣為父，但

註四六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二七二。

註四七：朱文原（編），《西安事變史料》，第四冊，頁四七三。

註四八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三三六～三三九。

註四九：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頁三三六～三三九。

註五十：白井勝美（著）、陳鵬仁（譯），《張學良與日本》（台北：聯經，1994），頁一一八。

蔣畢竟不是真正的父親；西安事變對蔣而言，是對其主權的挑釁，讓他在全國人前摔了個大跟斗；而楊虎城畢竟經驗老到，他深知依蔣的個性，一旦縱虎歸山，必定逃不了蔣的報復，因此並不願意釋放蔣介石，但在種種因素交錯之下，最後仍然不得不釋放蔣介石。釋蔣的下場，便如楊虎城所預料，遭到嚴厲報復：一被終生幽禁、一被暗殺身亡。

西安事變落幕後，隨即而來的是一場快速的審判鬧劇與特赦令的頒布。然而“體面的”特赦令背後，卻是更加殘酷的懲罰—蔣介石以管束為名，對張學良施以無限期地軟禁，剝奪其自由。所謂高等軍法會審，只不過是蔣介石所玩弄的把戲，立法毀法，在其一人。而張學良則萬萬不曾料到，南京一行竟是漫長幽禁生涯的開端。其由尚抱一絲取回自由的希望，到完全絕望，一生的青春歲月，在失去自由裡寂寥地度過。這幾年蔣氏政權式微、政治開放後，少帥總算重新擁抱自由，然而，卻已是一近百老翁，無法振翅高飛了。在宗教的洗禮下，對於前塵往事，他已不願再多言（註五一）。然而，史學工作者卻應該尋出真正的原由，為少帥、為所有的西安事變關係者，重新給予客觀且詳實的評價。

註五一：張學良在 NHK 的訪問中，對於許多問題不願回答，只言事業真相將會傷害到許多人，因此不願多言。見：臼井勝美（著）、陳鵬仁（譯），《張學良與日本》，台北：聯經，1994。

參考書目

1. 大風，《張學良的東北歲月—少帥傳奇生涯紀實》，北京：光明日報出版社，1991。
2. 司馬桑敦，《張學良評傳》（影印本）。
3. 王爰飛，《張學良的幽禁歲月》（上）（下），台北：先智，1995。
4. 臼井勝美（著）、陳鵬仁（譯），《張學良與日本》，台北：聯經，1994。
5. 朱文原（編），《西安事變史料》（三），台北：國史館，1994。
6. 朱文原（編），《西安事變史料》（四），台北：國史館，1995。
7. 何應欽，《西安事變的處理與善後》，台北：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，1984。
8. 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編輯委員會，《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》，台北：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委會，1984。
9. 李雲漢，《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》，台北：近代中國出版社，1982。
10. 李敖、汪榮祖（合著），《蔣介石評傳》（上），台北：商周文化，1995。
11. 松本一男（著）、吳常春（譯），《張學良—西安事變主角的命運》，北京：中國青年出版社，1992。
12. 張梅玲，《干戈化玉帛—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》，北京：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，1991。
13. 張學良，《西安事變懺悔錄》，收入：司馬桑敦著《張學良評傳》。
14. 郭廷以，《近代中國史綱》，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89。
15. 陳布雷，《陳布雷回憶錄》，台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，1967。
16. 傅虹霖，《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》，台北：時報文化，1989。
17. 趙雲聲，《張學良與趙四小姐》，台北：曉園出版社，1989。
18. 趙稜熹，《西安事變》，台北：漢湘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1995。
19. 端納，《我在孫中山、張學良、蔣介石身邊的日子》，台北：周知，1994。
20. 竇嘉緒，《歷史性的會見—周恩來與張學良》，收入：領袖交往實錄系列《周恩來》，四川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2。

參考論文、期刊

1. 于衡，〈訪現代史的關鍵人物—張學良〉，(12)《聯合月刊》(台北：聯合月刊社，1982:07)，頁96-99。
2. 畢萬聞，〈青年時代的張學良〉，(54)《歷史月刊》(台北：歷史月刊雜誌社，1992:07)，頁38-74。
3. 劉心皇，〈歷史的傷口—張學良被囚情結〉，47(4)《中外雜誌》(台北：中外雜誌社，1990:04)，頁15-18。
4. 蔣永敬，〈有關西安事變新史料〉，63(1)《傳記文學》(台北：傳記文學雜誌社，1993:07)，頁64-72。
5. 蔣永敬，〈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與中共之關係—兼介楊奎松新著「西安事變新探」稿〉，(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，1994:11)。

第五共和的法國 —密特朗時代

梁雅慧*

「在整個城市裏，我覺得自己是皇帝或建築師，我裁斷、我決定並且我裁判。」(註一)

「不要以為我的生命充滿著政治。政治並不是我的首選。政治是科學的奴僕，及哲學的卑微的譯員，它並不具備藝術的創造性的優點。它脫離對自然界的認識和人類的生活，政治好像是被摘下來的花朵和很快便萎謝的。夏季黃昏六點鐘的時候，在一排排的橡樹林望出去，我的精神會有很好的感受。」(註二)

「我現在在意的一件事是：大家對我的看法，不是和我同期的人的看法，而是未來歷史學者的看法。」

「個人的我，今日已逝。此後的我，將向國家獻身，向歷史負責！」(註三)

「歐洲失去了最熱情、最有影響力的先驅者」(註四)

「他為法國打造融入世界村的基石」(註五)

「密特朗以尊嚴莊重面對死亡」(註六)

*歷史學系大學部學生。

註一：楊子葆，〈塵塵往事記密特朗的雄心壯志〉《建築師雜誌》(台北：建築師公會，1995)，頁八二。

註二：〈密特朗酷愛文藝〉《國際現勢週刊》(台北：國際現勢週刊社，1981)，頁一三。

註三：密特朗於就職時所發表的言談。

註四：《聯合報》，1996年一月十一日。

註五：《聯合報》，1996年一月十二日。

註六：《中國時報》，1996年一月十一日。